

众缘成就的短篇小说《伤痕》

□卢新华

去年初秋,酷热依旧,中央电视台《见证》栏目摄制组来到上海,邀我配合拍摄一档叫做“见证伤痕文学”的电视节目。

29年过去了,许多往事恍如隔世,“若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”,以至于有时竟疑心起《伤痕》这样一篇如今静静地躺在文学史上,大概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已很少有人问津的短篇小说,当年是否真的出自我的手笔。也忍不住问:确曾有过“我”吗?这样想,更感到《伤痕》能够问世,端赖于当年的众缘相助。于是,“因缘”两个字一时竟如秋夜满把清光,訇然泻满心头,久久徘徊不去。也就进一步想:历史,其实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君不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哪怕再小不过的一件事,动辄也会牵扯到成千上万的“因缘”?有感于此,遂决定从尘封的记忆中搜索出几件与《伤痕》问世有着比较特别关联的因缘道来,以感谢和纪念那些曾为催生《伤痕》作出过特别贡献的师长和朋友,同时也给有兴趣的读者或研究者提供一点很可能是属于“野史”的资料吧。



卢新华

《伤痕》发表的“临门一脚” 有不同版本的传说

谈到《伤痕》,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及的,那便是《文汇报》的原总编辑马达先生,没有他的魄力、胆识和决心,《伤痕》这篇小说大概也就不可能最终与那个时代的读者结下不解之缘。

可是,据马达先生回忆,小说发表前,他曾将小说的大样送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批示。他们是好友,“文革”中曾一起蹲过牛棚,对时事有着许多相近和相同的看法。他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。而很快,洪泽先生也就批示“同意发表”了。所以,也可以这样说,洪泽先生的批示,是促成了《伤痕》最终发表的“临门一脚”。

然而,有趣的是,有关这“临门一脚”,后来又出现不同的版本。事情还得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大师赵丹先生的公子赵进说起。那时,因为赵丹先生打算拍《伤痕》,我与他们一家人很快也就相熟了。有一天,赵进忽然有些神秘兮兮地对我说:“你知道是谁决定发表《伤痕》的吗?”我有些懵懂,他于是说:“我和洪泽的女儿是同学,有一天她亲自对我说,‘知道吗?《伤痕》是我发表的。’我问她怎么回事,她说她有一天回家,她父亲坐在外面阳台的藤椅上读报,见她回来,马上招呼她:‘快过来,《文汇报》送来篇小说要我审阅,你帮我看看,要是好的话,我就签发了。’她忙接过来,一口气读完,结果大哭,就抱住她爸爸脖子,说,‘爸,发表,要发表!这样好的小说一定要发表!’可这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哟,你不怕爸爸再受连累,再去坐牢?’她爸爸就和她开玩笑:‘不怕,你不发表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!’她也撒起娇:‘那——我就签发了?’她爸于是说:‘签,快签,现在就签!’她说,并一把抓住她爸拿笔的手。就这样,《伤痕》很快见报了。”

这是一个后来又经作家薛海翔证实的故事。他亲口告诉我,他也认识洪泽女儿,洪泽女儿也亲口讲给他听过同样的故事。当然即便没有他证实,我也不怀疑,像洪泽这样在“文革”中受过许多迫害的老干部,读《伤痕》一定感同身受,情感上也一定支持发表,只不过女儿读后的强烈反应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罢了。所以,马达先生送呈洪泽批示,洪泽先生倾听女儿的意见,其实都是在内心已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后,为了觉得更踏实些,故向身边最亲近的人们寻求精神支持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。

众人面对着墙报稿《伤痕》伤心流泪

《伤痕》最初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版,责任编辑或者说主要负责与我联络的编辑,是当时的文艺部部长钟锡知先生。但在我的心中,《伤痕》最初问世的园地其实应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“七七级”“文学评论专业”班的墙报,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,地点是四号宿舍楼底层拐角处,主编则是同班同学倪镗。那时,我们刚刚进校,因为是十年“文革”后第一批通过考试入学,兼以名校,白底红字的校徽佩在胸前,人人都意气风发,恨不能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”。于是,就有人提议成立各种各样的文学兴趣小组,例如小说组、诗歌组、散文组、文学评论组等,并很快得到热烈的响应。

我本分在诗歌组,但接触鲁迅等20世纪30年代作家以及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多了,忽然觉得比起诗歌而言,小说的容量和影响更大,于是就动心起念“跳槽”到小说组。其时,班委会已然决定要出第一期墙报,并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。我后

来当然是因为受了鲁迅先生《祝福》一文的影响而写《伤痕》的,尤其许寿裳先生评《祝福》的一段话当时更令我激赏:“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,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。”然而,细细想来,最初的写作动机应该还有为出墙报“应差”的因素。《伤痕》是在泪水中完成的,因为深恶痛绝当时文章的假、大、空,写作过程中,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师承30年代作家们真实朴质的文风,只写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人物、真实的思想、真实的感情。

写完,自我感觉很好,但请个别老师和少数几个同学看过后,他们却不以为然,并向我提出了一大堆让我深感困惑的理论质疑。我于是由十分的自信转而十分的灰心,终于将手稿锁进抽屉。偏偏这个时候,沉着、稳重且总是面带笑容的小说组组长(兼班级墙报主编)倪镗同学推开寝室的门探进来,见我刚刚爬上靠窗的上铺,背倚墙壁,腿上垫一枕头,意欲开始“床头写作”,于是扬扬手,“嗨,过两天要出墙报了,你小说写好没有?得交

了。”我一时无语,连将《伤痕》捧出去交差的信心也丧失了,只能支吾道:“唔,知道了。”倪镗走后,我翻身下铺,坐到桌前,打算重写一篇。然而,只起了个头,就是写不下去,心里一松劲,还是将原本锁进抽屉的《伤痕》翻出来,用五百字一张的方格稿纸仔细看好,然后忐忑不安地交了出去。

然而,命运就这样改变了。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,好像是周末,忽然听到寝室门外一片嘈杂的人声,打开门走出去,但见门外的走廊上围满了人,正争相阅读着新出的墙报头条位置的一篇文章。大多是女生,不少人还在流泪。我忙探过头去,终于认出那稿纸上我的笔迹……自此以后,直到《伤痕》正式发表,这墙报前,便一直攒动着翘首阅读的人头:先是中文系的学生,继而扩展到新闻系、外文系以至全校。而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,也成了复旦校园的一大奇观。难怪后来有人夸张地说:当年读《伤痕》,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。

《文汇报》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发表《伤痕》

上海《文汇报》编辑钟锡知先生很快得到这个信息,凭着他对新闻独有的敏感,马上托人找我要去一份手稿。后来我知道,将这个信息传递到《文汇报》的,是住在三楼的一位我们中文系刚刚留校的女教师,名叫孙小琪。她曾在安徽蒙城插过队,钟锡知先生曾去当地采访过她们知青小组,并撰写了长篇通讯报道,此后便与知青中的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她先是将小说的情况说与她的一位女友自由听了(其人当时在安徽某县当县长,和钟锡知先生关系特别熟稔),因之迅即反馈给了钟先生。这样,《伤痕》这只纸叠的小船儿,经由她和她的女友的热心助推,蓦地驶入深广莫测的历史大海中。

然而,它那时的命运其实还是很不确定的。要去我手稿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,报社从没有给过我任何的允诺。我只是后来才从钟锡知先生那儿知道,他们当时打出了小样,在上海文艺界反复、广泛地征求意见,此后又遵总编辑马达之命,借开会之机去北京征求意见。火车的软卧包厢里,上海文联主席钟望阳

先生和他同行,再番谈到《伤痕》,钟望阳先生说:“如果你们《文汇报》不方便发表,就给我们用在复刊后的《上海文学》第一期吧。”可惜当时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我,是无从知道这些后来才“解密”的内部消息的。

有感于《伤痕》手稿自从进了《文汇报》便“泥牛入海无消息”,我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就建议我向《人民文学》投稿,还帮我整理了一份介绍《伤痕》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的信函,并一一认真地署了名。依稀记得的有李辉、顾海平、李湛、周章明以及同寝室的唐代凌、吴秀坤等。遗憾的是一个多月后收到的却是《人民文学》一纸铅印的退稿信。然而此时,《文汇报》方面也终于有消息了。是7月底或者8月初的一天吧,忽然有人带信要我去《文汇报》一趟。

那时,《文汇报》的社址还在外滩的圆明园路,楼高七层,贴瓷砖,铺地板,感觉很高也很气派。我是在六楼文艺部的一间面南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钟锡知先生的,他人不高,有些瘦,但很白很精干,稀疏的头发傲然而

扬,两眼明亮而有神。他告诉我:“你的小说可能要用,有些修改意见要和你谈谈。”依稀记得,意见大约有十六条。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“除夕的夜里,车窗外,墨一般漆黑,有影射之嫌;故后来改成‘远的近的,红的白的,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’”,同时加一句:“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”;至于车上“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,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”,则由编辑执笔修改成“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,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”;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“大伯大娘”,因为缺乏阶级属性,也被要求修改成“贫下中农”;而小说结尾,据说感觉太压抑,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,于是,我不得不让我笔下的主人公最后“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”。

现在看来,这些修改意见尽管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思维的某种局限,却也真实地反映出《文汇报》同仁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发表《伤痕》时,所表现出的一种极其细致和负责的精神。



发表于《文汇报》的短篇小说《伤痕》。



电影《伤痕》海报。